

档案文献编纂学

辅 导 提 要

曹喜琛 刘耿生 编著

一九八七年十月

档案文献编纂学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

曹喜琛 刘耿生编著

武汉市档案学会

说 明

本《纲要》是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档案专业档案文献编纂学教学编写的辅导材料，它概括地介绍了《档案文献编纂学》教材及本课主讲教师在讲课录音中电大学员必须掌握的理论问题；在各章后附了参考书目，提供给学员在学习时配合深入领会教材中论述的原则与方法，并在今后从事编纂工作实践中做为参考借鉴；为了引导同学们全面、深入地复习，我们还为各章出了思考题，基本反映了各章的要点。答题时应掌握本《纲要》的有关部分，因此本书是同学们必备的参考材料。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尤其时间仓促，急于应教学之需，书中难免出现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著 者

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二章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总述	(19)
第三章	编纂选题与编前研究	(35)
第四章	档案史料的查找	(50)
第五章	档案史料的挑选	(63)
第六章	档案史料的考订和选本	(91)
第七章	档案史料的加工	(110)
第八章	档案史料的标题	(126)
第九章	汇编内档案史料的编排	(135)
第十章	汇编内评述性材料的编写	(143)
第十一章	汇编内查考性材料的编写	(166)
第十二章	汇编内检索材料的编制	(177)
第十三章	汇编的序言和编辑说明	(192)
第十四章	汇编的出版工作	(206)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

一、档案文献

档案文献是档案文献编纂的客体，研究档案文献编纂学必须弄清楚档案文献这个概念，而档案文献又是整个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首先要明了什么是文献。

（一）文献

在我国流传至今的古籍中，文献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论语》一书中。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孔子在这里采用了文献这一概念，其中也包含着他对文献作用的认识，即缺乏文献不足以证实历史。

在我国典籍中，较早解释文献的含义的要推南宋学者朱熹，他在为《论语》作的注解中说：“文，典籍也；献，贤也。”典籍原指古代记载法制的书籍，可以理解为档案文件；贤指贤人、贤材，引申为熟悉掌故的人所讲的话，发表的议论，记录下来，称为献。

元朝人马端临在其编纂的《文献通考·总序》中，对文献作了一番叙述，基本上沿用了朱熹的解释，并有所发挥，他把书而记载称为文，把学士名流的议论称为献，即所谓“叙事为文，论事为献”，从《文献通考》的编纂形式也可以证实马端临对文和献是严格区别的：凡叙某事，顶格书写的，都是

书本记载；凡论某事，则低一格书写，都是名流贤者的议论。

直至清代，大体仍沿用宋、元学者的上述看法，大同小异，如清人杨宾在其《柳边纪略》中即如是。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古人认为：第一、文和献是有不同含义的，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书面记录，献则是后人对历史上某事所发的议论，追忆的记录；第二、文和献的共同点，便都是文字材料，都有印证史实的作用。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间其它一切事物一样，文献也不断地发展、增新，旧有文献的含义已难以概括复杂万端的文献客体，因此，我们应当在总结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面对现实存在着的新旧参杂的文献客体，探求文献的科学定义。

我们论为，文献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价值的文字、声音、形象的记录，它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1. 文献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们的实践活动领域是极其广阔的，主要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项实践活动，说明了文献的来源和性质，它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的实践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受阶级地位和阶级意识影响，因而，文献（除记述自然和科技现象的以外），就其内容来说，大都是有阶级性的，这是文献的第一个特性，也是我们对文献的第一个基本认识。

2. 文献是有价值的材料。这一方面是对前者在范围上的限定，另一方面所谓有价值，是它不以材料的重要程度，正面与反面等情况为转移，只要具有某种价值（尽管其价值有大小之分），均可称为文献。因为重要与否是相对的，以

此划分文献的界限必然失去客观准绳；无论是正面文件还是反面文件，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如果反面文件不算文献，那么在历史上形成于统治阶级之手的大量文献，势必被排除于文献范围之外，这就等于说历史上几乎无文献可查了，显然是说不通的，进而论之，文献的价值也不受材料的真伪，内容的正误等所左右。材料的真与伪，内容的正确与错误，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文献的凭证与查考价值恰恰在于文献本身具有的这种客观性。这是文献的第二个特性，也是我们对它的第二个基本认识。

3. 文献的外在形式。文献是实践活动的产物，是意识的记录，但它不是实践和意识本身，这种记录一定要附着在一定的物质上面，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称之为载体，也就是说文献一定要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文献的直接载体是指记录人类认识的具有一定意义的符号，如文字、图形以及现代化的声波、电波等；间接载体是承载和传递符号的客体，如骨（甲骨）、石（石刻）、铜（铭文）、竹（竹简）、木（木牍）、树皮、羊皮、织物（绸帛）、纸张以及现代的化学材料（胶卷、胶片）、磁性材料（计算机的储存单元、磁带、磁盘）等等。概括地说，即是文字的、声音的、形象的记录。不同载体具有不同时代的特征，通过文献的不同载体的鉴别文献的真伪，以及研究不同载体的文献在正文转达上的特点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意义。这是文献的第三个特性，也是我们对它的第三个基本认识。以上这三层含义基本上包含了文献的特征和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一点，便可能导致对文献完整概念的误解。

文献种类繁多，如文件、档案、图书、报刊、家乘、谱

牒等文字记录和照片、影片、录音、录象等声、象记录均属之，唯古代不带有文字记录的器物、遗址等实物史料不包括在内。

（二）档案文献

档案既属于文献之一种，它与文献必有共性，具有一般文献的共通的方面，已如上述。但它自然也有与其它文献不同的个性，主要表现为两点：

1. 它具有原始性，即人们通常说的第一手材料。

2. 它具有权威性，与其它文献相较，它具有或曾经发生过法律效力，在一事有不同记载的情况下，一般以档案的记载为准，它的凭证作用较其它文献更为可靠。

档案文献编纂学着重研究档案这种文献编纂的原则与方法，同时不可避免地应用一般文献编纂的原理和原则，在编纂实践中也往往是档案与其它文献并用的，因此，我们这里使用档案文献这个概念具有双关的意义。

二、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

档案文献编纂学是研究档案文献编纂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科学科目，它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一）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对象

档案文献是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依据和条件，但是，档案文献的客观状况同人们利用要求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其中解决档案史料的浩繁，芜杂和副本的有限性同人们利用要求的专题性、科学性和广泛性之间的矛盾，便是档案文献编纂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探讨解决这种矛盾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学问，便构成本学科的研究对象。

（二）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基本内容

它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编纂题目的选定，档案文献的

查找、选择、考订和选本，档案文献的加工、标点、标题和编排，档案文献的评述性材料——注释、按语、序言的编写，档案文献查考性材料——年表、插图、备考、凡例的编制，档案文献检索性材料——目录、索引的编制，档案文献出版物的校对和技术设计。

上述内容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便组成为本门学科的科学体系。

（三）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根本任务

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总结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现实经验和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上，揭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发展规律，制定和不断完善它的理论和方法，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档案文献的利用需求，是本门学科的根本任务。

（四）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原则方法

具有中国特点的档案文献编纂的研究，应遵循下述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1. 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档案文献是一种社会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阶级的属性，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一项具有比较强的政治思想性的资料工作，这就决定研究本门学科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它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观点分析并评述档案史料的价值和公布史料的意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和阐述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解决编纂工作中各项理论与实际问题。

2. 它属于应用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认真总结实践经验是本门学科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力量源泉。在着重研究

和总结中国现实的特别是各级档案馆（室）的编纂工作经验的同时，也要认真吸取历史的、档案馆（室）以外有关部门的编纂工作经验，还应当注意批判地吸取外国的有益经验。在研究中不但要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也要注意深入探讨具体的技术方法，以便更有效地发挥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3. 它是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借鉴历史学特别是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史学研究的动态和情报，对本门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吸取文献学、目录学、考据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文字学、文书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是丰富和发展本门学科的必要条件。

第二节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历史发展述略

我国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孔子编订《六经》算起，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历代相因，连绵不断，其规模之巨大、成果之繁富，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历史上的文献编纂活动及其积累的成果，凝聚着关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丰富的思想素材。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虽然尚未发现有关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专门著述，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还没有形成，但是，确有一些学者、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在他们从事文献整理编纂的历史研究中，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发展提供和奠定了必要的思想资料，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这一历史遗产，进行认真的挖掘和探讨。

一、孔子编订《六经》及其编纂思想

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渊源于它的最初实践活动，在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是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其中《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典型的档案史料汇编。

（一）孔子编纂《六经》的政治目的及意义

孔子（公元前551年——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人。孔子生存的春秋时代，正是我国社会历史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是时孔子以周公自命，反对社会改革，企图恢复日益没落的奴隶制，为了推行他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然而到处碰壁。在无可奈何之际，转而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编纂，以“追记三代之礼”，并通过兴办教育的途经，以所编《六经》为教本，传播其思想主张，以达其“拨乱世反之正”的政治目的。尽管这一目的不可能实现，然而孔子的这些活动一方面普及了教育，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另一方面整理了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使之流传下来。孔子不愧是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和文献整理编纂家，他在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上占有开创性的历史地位。

（二）《六经》内容

《六经》是孔子对“先王之陈迹”加以整理编纂而成的“比次之书”，即我们今天称的“史料书”，“史料汇集”之类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它们“非孔氏之书”，“非孔子所作”，自然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恰当的。

孔子所从事的基本上是史料编纂工作，而不是史书的撰写工作，具体地说，《易》讲卜筮的，其中有一些哲学思想，属于哲学史料；《诗》是春秋以前平民与贵族的诗歌汇集，

不仅是文学史料，也是研究殷周的有价值的社会史料；《书》是档案文献丛编，其中保存了虞、夏、商、周几个时代的档案史料；《礼》是古代典章制度的汇集；《春秋》是据鲁史取材编纂的大事记。

总之，基本上是属于史料汇编性质的文献，是研究我国上古历史的稀有的有文字可考的史料，它们得以流传至今，孔子的编纂和历代辗转校订翻刻之功是不可泯灭的。

（三）孔子编纂《六经》遵循的原则

1.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只阐述文献中的文辞而不发挥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去喜爱档案文献中反映出的历史事实。这是孔子编纂历史文献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他认为把事实照录下来，要比自己空发议论深切明白得多，正因为如此，《六经》才被看成是研究历史的可靠史料。孔子倡导的这一编纂史料的思想，为我国历史档案文献编纂开创了科学的原则，它为我国迄今以来历代治学严谨的学者所推崇和遵行。

2. “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谈关于怪异、勇力、叛乱和神鬼之事，即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孔子在编订《六经》过程中，对古国文献中大量有关鬼神的糟粕都本着上述原则加以删除，所以《经》书中很少有涉及鬼神主宰之类芜杂妄诞的篇章，这条原则对于编纂选材来说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3.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批判、排斥那些不正确的议论，这些祸害就可以消灭了，所谓异端，就是与孔子学说相对立或不同的观点，也就是反中庸之道的议论。孔子生活在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动荡时代，他的

思想观点，政治主张受到其它学说的非难和反对，而他也把与自己学说对立的观点称为异端，这是“百家争鸣”时代的反映，在编纂文献时，删除自认为是有害的见解，是不足为怪的。这也正好说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不可能与编者的政治观点脱离，不能不服从于编纂的政治目的。然而孔子的这条标准，在今天看来，显然是有其阶级与历史局限性的，排斥一切与编者观点对立的材料，于编纂选材来说，并不是完全可取的。

4. “多闻阙疑”，“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要求多听、多看，对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而不妄行校改。在进行必要的校改时，则应采取不臆断，不武断、不固执，不主观的态度。这是孔子推崇科学治学态度，也是编纂文献应当遵循的正确原则。

二、刘向、刘歆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及其方法

汉王朝建立以后，统治阶级十分重视文献典籍的搜求和整理工作。当时的校书也就是整理书，当时的书也包括档案文献等各种典籍。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由当朝统治者亲自主持，由刘向总其成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刘向是我国古代的文献目录学家。他死后，哀帝即位，令刘向之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整理文献的事业。

刘向把整理好的文献“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刘歆则完成了《七略》的编撰，史称《七略》，《别录》为中国目录学之鼻祖。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把版本、校勘、整理、目录等工作熔为一炉，其中包括着档案文献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因而其思想成果自然应当作为档案文献编纂学

的遗产加以认真的总结和批判地继承。

刘向校书十九年，其整理文献的程序和方法，归纳为如下几个环节：

（一）“广罗异本，仔细校勘”，即把一件文献的不同版本尽量收罗齐全，如以比勘。

（二）“彼此互参，去其重复”。

（三）“校出脱简，订证伪文”，即对文献中的缺脱、文字上的讹、夺、衍、倒进行加工作。

（四）“整理篇章，定著目次”，即对文献进行编排，制定目录。

（五）“屏弃异号，确定书目”，即如一部文献有诸多书名，定为一书。

（六）“每书校毕，写出叙录”，即每校定一部文献，写成一篇“叙录”，以介绍作者生平、行事、思想内容，写作价值以及学术流派和校雠经过，实际上相当于一书的小序是后世书目解题的开端，最后他又把各书的叙录全文汇编在一起，称为《别录》。

综观上述，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献编纂在实质上是同一种工作，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熔于古代的文献学、校勘学、目录学之中的。

三、《资治通鉴》与司马光的史料编纂思想

司马光主持编修的《资治通鉴》，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极负盛名的历史巨著，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它与《史记》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史学的“双壁”。

《资治通鉴》的思想性不如《史记》，但它在编修方面确实很有特点，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资治通鉴》卷幅浩大，编修历时多年，又先后由几个助手协修，为了保证这部书“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司马光“研精极虑，穷竭所有”对整个编修工作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尤其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纂上，更有其独到之处，在历史编纂学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档案史料编纂学的思想，兹分述如下：

（一）史著撰写与史料编纂的紧密结合

《通鉴》的编修程序大体分为三步：先作丛目，次作长编，最后删削定稿由司马光亲自动笔。丛目实际上是一种附有史料索引提纲，它是为长编服务的。长编是依据丛目的规范和指引，将事目下附注的全部史料“尽检出一阅”，斟酌详略，比较异同，作出取舍，然后抄录下来并加以排列，成为长编的正文。同时，还要在正文之下注明异说，并说明取舍的理由。显然易见，长编就是史料汇编。

丛目和长编为《通鉴》编修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丛目几乎把有关史料网罗殆尽，并据事目加以排列，使错综者归于一炉，较好地解决了史料的广泛收集和初步整理问题。长编着重在史料的鉴别、筛选和考证上下功夫，是更高一级的史料整理工作。收入长编的史料已经过严格挑选，准确可靠，可以放手采用。长编以宁繁毋略为原则，史材充足，各载异辞，撰写《通鉴》正文时便可以容取舍，左右逢源。这样一个内容翔实的史料汇编，完全可以成为编修《通鉴》的直搜依据。事实上，《通鉴》正文就是由司马光在长编的基础上删削润饰而成，以至有人把长编看作《通鉴》的草稿。

司马光首开修史先作长编的先例，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纷纷效仿。

在编纂长编的过程中，编者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凡某事并见于诸家记载，均须认真比较异同，验明正误，并须将考证结果和去取的理由在正文之下用小字注明。《通鉴》成书之际，司马光等又将长编中的这些注释文字汇辑成专帙，由此产生了《通鉴》的一部羽翼之作——《通鉴考异》。司马光赖长编以成《通鉴》正文，借《考异》以羽翼《通鉴》本书，以长编为起点，以《通鉴》为目的，把史料编纂与史书撰著高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长编的编纂原则与方法

1. 丛目未成，不可遽然作长编，这是司马光首先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正式作长编之前，先要作丛目。丛目又包括事目与附注两部分。事目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重要史实的纲目，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说的“选材提纲”。附注是在各该事目下对全部有关史料所作的著录，相当于现在的史料索引，事目从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上对选材起着要求和限定作用，附注则对查找史料起着指引作用，有了它便可“按图索骥”。丛目对长编编纂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择善而从，兼收并蓄，这是司马光在史料鉴别选用方面所提出的原则要求之一。史料查找收集齐全之后，有关同一史实的记载往往众说纷纭，详略不一，真伪杂揉，如何取舍，勒成长编正文呢？司马光果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首先要择其善者而从之。所谓择善，包括辨别真伪，考证异同，比较详略，删繁就简，校订文字诸端；其次

是要兼收并蓄，即对那些年月事迹不合的记载以及其它异辞或说，不能弃而不顾，而应通过注释的形式加以保留。

3. “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这是司马光关于史料鉴别选用的又一重要思想，其实质在于注重史料内容而不囿于其形式。司马光敢于正视官修《实录》、正史的不足，指出其不可尽据，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注意旁取杂收，广泛取证，这也是司马光超越一般史家之处。

4. 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这是司马光要求编排史料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种编排史料的方法源于《春秋》，是古代史学的传统方法，或称为“时间本位”。《通鉴》为编年体，上下贯穿一千三百多年，因此时间观念至关重要，作丛目和长编同样不容忽视时间的准确性。

5. “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这是长编取材的一个总的、基本的原则，也是最为人所称道的一个原则。按照司马光的要求，列事目、作附注、取舍材料、编写注文，都要贯彻这一原则。

司马光提出的史料编纂原则与方法，不限于提纲的编写和史料的查找、著录、鉴别、选用及排比，还涉及到其它许多方面：划一纪年标准；注释，除注明异说之外，还要注人物；对长编的书写格式和字体，也有详细明确要求。

四、章学诚的史料编纂思想

章学诚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他在史学、方志学、目录学、校讎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对档案史料